

“一带一路”历史背景下新疆蒙古族女性袍服的演变

葛梦嘉， 蒋玉秋*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服饰具有显著的民族与地域特点,同时新疆位居古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借鉴从未中断。通过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3个地区的卫拉特蒙古族女性袍服的分析,得出新疆不同地区蒙古族袍服的装饰手法、纹样以及色彩迥异,并从蒙古袍服色彩及装饰纹样两个方面,探究了“比西米特”袍服突破传统袍服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新疆;蒙古族;女性袍服;伊斯兰艺术;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J 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7)05-0441-05

Evolution of Mongolian Women’s Robes in Xinjia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GE Mengjia, JIANG Yuqiu*

(College of Fashion Art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Oirad Mongolian costumes in Xinjiang have significant 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Xinjiang ranked in the East and West traffic fortress of the "Silk Road". It has already been a multi-ethnic areas.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learning between each other are never interrupted. This paper took the Mongolian women’s gowns in Xin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eld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the related towns of Xinjiang Baying Golo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Boertai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of Hoboksar, to analyze the decorative techniques, patterns and colors of the various districts of Xinjiang. In addition, the reas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Bisimid gowns and its creativit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robe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of color and decorative pattern.

Key words: Xinjiang, Mongolian, gowns, Islamic art, Tibetan Buddhism

“一带一路”战略以古丝绸贸易的发展为背景,通过历史符号的带动,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新疆,史称西域,是“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地区。《史记》记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继张骞“凿空西域”之后,“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绸之路”逐渐成为沿途各国商贸往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同时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也都在新

疆汇聚。中国称古代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当时因商业往来致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华扎根^[1]。

新疆蒙古族在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中与周边少数民族频繁接触、交流,从和布克赛尔地区蒙古族“比西米特”女性袍服中可以看到这一地区蒙古族对于伊斯兰教艺术文化的认同。目前,国内外从服装纹饰及色彩的角度对蒙哈文化交流的研究较少,仅王松^[2]对此问题进行了比对分析。文中通过

收稿日期:2017-08-07; 修订日期:2017-09-20。
基金项目:北京服装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ZDJG-1601)。
作者简介:葛梦嘉(1993—),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蒋玉秋(1978—),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服饰。Email:sokoo929@sina.com

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比西米特”袍服的收集与整理,分析其装饰及色彩的改良、创新与传统袍服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背景下形成多样性地域文化及宗教对民族服饰所产生的影响。

1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沿古丝绸之路迁徙情况

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随之衍生的则是不同民族群体间广泛的文化借取,进而促成民族间的文化交流^[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就是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13 个世居民族在新疆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不断产生与发展。1856 年俄国人瓦里汉诺夫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考察时发现当地维吾尔族“向汉族人学到一些艺术和技艺,借用不少词汇,中国的一些建筑名称、服装用语及一些阔绰奢侈的词汇移入当地人的语言中,并且大多数的词汇借用于书面行文中……^[4]”

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主要属于卫拉特蒙古族,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记载,史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时也称卫拉特、厄鲁特等。清朝学者张穆著《蒙古游牧记·额鲁特蒙古总叙》中载:“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古特;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皆姓绰罗斯;曰土尔扈特,姓不著。部自为长,统称厄鲁特,即明史所谓瓦剌者也。有辉特者,姓伊克明安,最微;初隶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迁徙俄罗斯,辉特遂为四卫拉特之一云。”即卫拉特蒙古分为四大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

在明朝末年(公元 1628 年),蒙古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等部人民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了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即新疆塔城地区),越过哈萨克草原(即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渡过乌拉尔河(流经俄罗斯联邦及哈萨克斯坦),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后的 140 余年里,土尔扈特部一直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18 世纪,随着沙俄的对外侵略扩张,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兵,大肆征兵导致部族内青壮年人数锐减,同时沙皇俄国要求其俯首称臣,面对内外的种种事态,1767 年土尔扈特汗国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决定东归故土。他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途径乌拉尔河、伊尔吉兹河、巴尔喀什湖等地,最后抵达新疆伊犁地区。

东归之后,清朝乾隆皇帝下旨“将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等部众安置于博尔塔拉、额尔齐斯(今新疆富蕴县)、斋尔(今新疆北部地区)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5]”现其后裔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简称和平)3 个地区。

2 从“五色”到“尚黑”的审美转变

佛教教理通过各种渠道(如中亚、汉地和泥婆罗等地区)传入吐蕃,形成藏传佛教,所以说藏传佛教的最终形成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6]。对于活跃在新疆北部的卫拉特人来说,16 世纪末就有卫拉特的贵族入藏修习佛教,而宣布全体卫拉特的皈依藏传佛教则要推到 17 世纪前半叶^[7]。

在蒙古族哲学思想上,成吉思汗首先提出了“五色”和“麻哈布德(四种)”等概念^[8]。成吉思汗向子孙讲述统一中国大业时,提到要统一“五色四邻”的思想^[9]。在《白史》跋文中讲:“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荫的庇护里,成吉思汗的恩泽里,五色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莎郎合思、速而不思,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10]……“五色”即红色的汉族,蓝色的蒙古族,白色的朝鲜族,黄色的西域各族及黑色的吐蕃族^[9]。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五色”在藏传佛教教义中有多彩的涵义,这与道教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象征宇宙万物^[11]。因此“五色”有时不局限于五种颜色,也不强调统一如邦典,确切表达时往往与宗教的教义有关^[12]。由于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经文,所以在他们看来,寺庙中的五色经幡随风飘动就代表诵经,并借以祈求神灵庇佑。图 1 为新疆和硕县藏传佛教庙宇前的五色经幡。



图 1 新疆和硕县藏传佛教庙宇前的五色经幡

Fig. 1 Five colors prayer flags before the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in Heshuo of Xinjiang

藏传佛教中“五色”为红、黄、白、绿(代黑)、蓝,在教义中本是各有所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族装饰图案中藏传佛教的纹样及色彩本意逐渐淡化,“五色”已被蒙古族人民重新赋予新的内涵。蓝色代指蓝天、绿色代指草原、白色代指羊群、黄色代指土地、红色代指火焰。这种单纯的形式美已融入了蒙古人民的审美意识之中。从传统的新疆蒙古族女性“太日里克”袍服来看,无论是传世实物还是照片,从未有过一件黑色的。传统的“太日里克”袍服面料基本选用提花缎或是妆花面料,图 2 为和静县东归博物馆中两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新疆蒙古族“太日里克”袍服,可作为有力的物证。这两件袍服时间大致可追溯到清末,是目前新疆地区年代最为久远的传世“太日里克”袍服。



图 2 新疆和静县东归博物馆馆藏“太日里克”袍服

Fig. 2 Tairilike gown collected in the Museum of Heshuo, Xinjiang

“太日里克”袍服结构如图 3 所示。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蒙古女性传统“太日里克”袍服基本形制为“十字形”的平面裁剪结构,立领、连肩袖、直角对襟,基本的服装结构沿袭了元代以来的服饰形制。

居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布克赛尔地区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 1775 年清政府划分栖息领域给旧土尔扈特^[2]。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因独特

的地理位置及长期与哈萨克族杂居一地,这里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女袍形成了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区不同的服饰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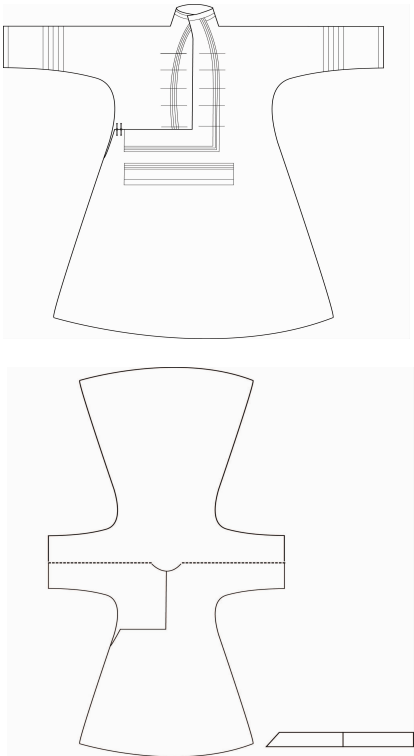


图 3 “太日里克”袍服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the Tairilike gown

“比西米特”袍服在传统“太日里克”袍服形制的基础上改良、创新而形成的一款袍服,图 4 为和布克赛尔地区“比西米特”袍服。“比西米特”袍服的具体出现时间目前难以准确推断,但据现有资料可推测此款袍服应出现于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东归之后,目前仅有和布克赛尔地区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穿此款黑色袍服,巴州、博州地区的土尔扈特及和硕特部皆不穿此款袍服。



图 4 和布克赛尔地区“比西米特”袍服

Fig. 4 Bisimid gown in the Hebukesai'er district

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蒙古族穿着黑色“比西米特”袍服,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新

疆卫拉特蒙古族并不崇尚黑色,传统“太日里克”袍服从未使用过黑色面料。但哈萨克族人尚黑,在《新疆概观》(民国二十二年仁声书局铅印本)哈萨克人民俗生活中载:“男女均尚黑色”。并且阿尔泰语系民族有以黑山泛称一切高山的习惯,可以看出,黑色对于哈萨克族人来说有巨大、强大的含义^[13]。哈萨克族男性服装多选择黑色及深色调来表现男性的气概,图 5 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哈萨克族上衣。



图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哈萨克族上衣
Fig. 5 Kazakh shirt Museum Collectio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蒙古族的黑色“比西米特”袍服展现了其对哈萨克族服饰色彩的吸取,实际上也是对哈萨克族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艺术理念的接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传承人制做的“比西米特”袍服如图 6 所示。



图 6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传承人所做“比西米特”袍服
Fig. 6 Bisimid gown made by the inheritor of Hebuke-saiér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ry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蒙古族女性袍服,以黑色为底,绣线多选择颜色艳丽醒目的色彩,以黑色底反衬显得较为醒目。所有的刺绣部分不似苏

绣般精细华丽,但明显带有草原民族的粗犷感,手绣与机绣相结合,从中可以看出和布克赛尔地区的蒙古族对于伊斯兰教艺术文化的认同。

3 从伊斯兰教艺术到蒙古族袍服纹饰的归属

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古兰经》作为伊斯兰千古不变的信条和神圣的经典,这样说道:“绘制图像是效仿真主创造生物,却不能赋予生命,因此应受惩罚。”因此哈萨克族的艺术表现特征都基于植物、花卉等图案为原型进行再创造。如图 7 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哈萨克族刺绣坐垫。对于动物的图案一般只提取动物角纹作为元素,并与植物纹样相结合。在哈萨克先民们看来,公羊角、鹿角等都是神灵的化身,是生命的标志,是灵魂永生的象征^[14]。植物纹作为为伊斯兰民族的艺术装饰母题,在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有广泛的运用。早期的植物纹是枣椰树叶变形而来,后来出现了弯曲茎蔓的葡萄纹,最终发展为波状曲线的几何纹。9 世纪后,渐为抽象纹饰^[15]。作为草原民族的新疆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居”,将植物纹样通过刺绣、贴绣等方式装饰于服装、生活用品中,形成较为独特的民族特点。



图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哈萨克族刺绣坐垫
Fig. 7 Kazakh embroidered cushion collected by the Museum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的蒙古族因长期受到哈萨克族文化及艺术审美的影响,此地区的蒙古族袍服中同样大量使用植物纹样,并以刺绣的形式来表现,刺绣的针法主要分为平针绣、锁绣、接针绣等。新疆蒙古族“比西米特”袍服,以黑色为底,在领缘、袖缘和摆缘均装饰植物纹、动物角纹等刺绣图案,在袖缘处会选择绣制铜钱纹等纹样,图 8 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比西米特”袍服。“比西米特”袍服中铜钱纹的出现既保留了藏传佛教“圆通”、“圆觉”、“圆满”的宗教精神,又结合伊斯兰艺术的植物纹、动物角纹的宗教表达,这种独特的装饰文化也承载了其精神寄托与信仰。



图8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比西米特”袍服

Fig.8 Bisimid robe collected by the Museum in Boertai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4 结 语

“一带一路”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历史上以古丝绸之路为依托的新疆各民族发展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为现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参考。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蒙古族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并长期与哈萨克族杂居一处,受其思想、文化的影响,使服饰上逐渐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的表现形式。“比西米特”袍服所呈现出的伊斯兰艺术文化,也显现出相同的民族部落在不同地区所产生的装饰审美区域性差异,这也成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一统多元”的生动实证。

参考文献:

- [1] 卓新平.“一带一路”上的宗教历史积淀与现实处境[J].中国宗教,2015(6):30-31.
ZHUO Xinping.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J]. China Religion,2015(6):30-31. (in Chinese)
- [2] 王松,王凡.新疆蒙古族比西米特服饰中的伊斯兰艺术因素[J].装饰,2015(6):120-121.
WANG Song, WANG Fan. Islamic art factors in mongolian bisimid dress in Xinjiang[J]. Art and Design, 2015(6): 120-121. (in Chinese)

- [3] 赵海霞.论清代新疆民族迁徙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J].西域研究,2016(1):43-49.
ZHAO Haixia. On the migration of xinjiang and its influence on ethnic relations in qing dynasty[J].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2016(1):43-49. (in Chinese)
- [4] 魏长洪,何汉民.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
- [5] 郭美兰.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17(2):56-66.
GUO Meilan. East migrating of the Turehot Ubashi Khan tribe [J].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2007,17(2):56-66. (in Chinese)
- [6] 图齐,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M].耿昇,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14.
- [7] 高琳.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兴起和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9.
- [8] 蔡·呢玛.论元代蒙古族宇宙观[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19-26,100.
Cai · Nima. On the cosmic outlook of Mongolian in the Yuan Dynasty [J]. Journal of Chifeng College (Social Science),1993(3):19-26,100. (in Chinese)
- [9] 宰桑·布和.大黄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10] 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J].民族研究,2016(2):85-97.
Borjigidai oyunbilig, KONG Lingwei.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in mongolian historiography [J]. Ethno-National Studies,2016(2):85-97. (in Chinese)
- [11] 胡化凯,吉晓华.道教宇宙演化观与大爆炸宇宙论之比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4(2):11-16.
HU Huakai,JI Xiaohua. Comparision of the cosmos evolution idea of Taoism and Big-Bang[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8,14(2):11-16. (in Chinese)
- [12] 嘉益·切排.藏传佛教各教派称谓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24(3):67-69.
JIAYI Qiepai. The textural research of Tibetan Buddhism sect appellation[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Han version),2003,24(3):67-69. (in Chinese)
- [13] 孜娜提古丽.哈萨克族女性传统服饰色彩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 [14] 徐梦泽.新疆哈萨克族菱形纹样装饰艺术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5.
- [15] 仲高.西域艺术通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429.

(责任编辑:卢杰,邢宝妹)